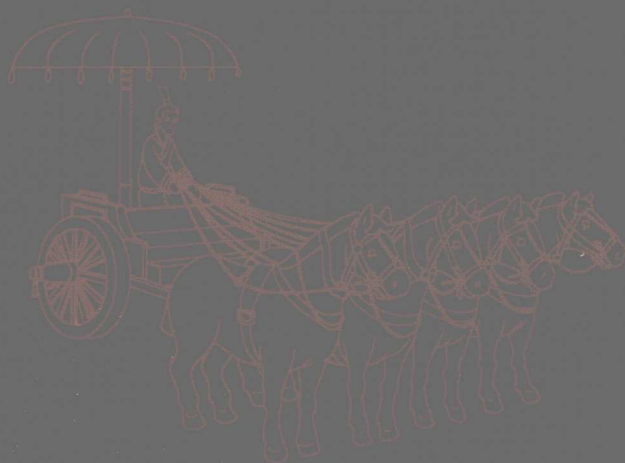


中华上下五千年



文化
百科
丛书

苏连营 主编



四

辽海出版社

09

2

中华上下五千年



文化百科丛书

主编 苏连营

辽海出版社



怱；马政不讲，骑士不熟；豪杰不出，英雄不收；馈粮不丰，形便不固；出砦不修，堡垒不设”，反对用兵。谏议大夫李大异也反对用兵。结果华岳被流放，李大异被罢斥。五月，金章宗（完颜璟）闻宋将用兵，命平章事布萨揆会兵于汴（今河南开封），加以防备。六月，韩侂胄力排对北伐的不同意见，以程松为四川制置使（后改宣抚使），吴曦为副使，准备北伐时进袭陕西。与此同时，宋宁宗下诏内外诸军密为行军之计，并令诸路安抚司教阅禁军，准备北伐。七月，宋以韩侂胄“平章军国事”，位居丞相之上，并兼“国用使”，集政权、军权、财权于一身，置“机速房”于私第，总理一切军务，成为北伐的大本营。八月，宋声言增戍边境是为防备他盗，决无意与金对抗。金章宗听信此言，罢河南宣抚使及新置兵。就在金国边备松弛之时，宋命湖北安抚司增招神劲军，以郭倪为镇江都统兼知扬州，积极备战。



天目盞

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三月，以邓友龙为两淮宣谕使（后改宣抚使），镇江都统制郭倪兼山东说东招抚使，准备进军山东。同时以荆鄂都统制赵淳兼京西招抚使，副都统皇甫斌为副使，准备从襄汉北上。皇甫斌在金防备松懈的情况下，发兵四万取邓州，三万取唐州（今河南唐河），金章宗闻讯大惊，复命布萨揆领行省于汴，河南诸军皆听节制，分兵驻守要害之地。此时，宋兵已分路攻金，镇江武锋军统制陈孝庆与武义大夫毕再遇克复泗州（今江苏盱眙北），江州左军统制许进克复新息县（今河南息县），光州忠义人孙成克复褒信县（今河南新蔡县南）。五月，陈孝庆又克复虹县（今安徽泗县），接着，马军司后统制田俊迈率兵渡淮，淮河岸边的忠义也与官军配合，相继克复了一些县城。

宋军一连串的胜利使韩侂胄认为大事可成，于是下诏伐金，各路一齐进击。但此时金军已做好迎战准备。郭倪所派进军宿州（今安徽宿县）的田俊迈、郭倬、李汝翼被金军击溃，退屯蕲州（今湖北蕲春），田俊迈被郭倬出卖，为金军所杀。接着金军又追击郭、李至灵壁（今安徽灵壁），幸有毕再遇英勇抵抗，郭、李方才能安然回到泗州。与此同时，建康都统李爽攻寿州（今安徽寿县）失败，皇甫斌败绩于唐州，江州都统王大节攻蔡州（今河南汝南），不克而溃。韩侂胄几次督促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出兵陕西，吴却早有异志，按兵不动，暗中与金人勾结，准备降金。六月，韩侂胄以师出无功，罢免两淮宣抚使邓友龙，以丘密代之，驻军扬州。丘密主张放弃泗州，还军盱眙，同时要求惩治败军大将。韩侂胄一一听从，斩郭倬，贬斥王大节、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苏师旦也被除名韶州（今广东韶关）安置。

十月，金分兵九道大举南下，舍呼沙呼率山东兵两万出清河口（今江苏淮安北），左监军完颜充率关中兵一万出陈仓（今陕西宝鸡），右都监富察贞率兵一万出成纪（今甘肃天水），蜀汉路安抚使完颜纲率汉、蕃步骑一万出临潭（今甘肃临洮），临洮路兵马都总管石抹仲率陇右步骑五千出盐川（今甘肃陇西西），陇州防御

使完颜匡率兵五千出来远（今甘肃武山西南）。其中完颜匡一路南下，陷枣阳、襄阳、随州，进围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并派军攻下应城、云梦、孝感、汉川等地，襄汉很快沦陷。韩侂胄急以丘密督视江淮军马，在淮河南岸增兵防守，企图保住两淮。无奈宋军军心已散，在金兵的攻击下四处奔逃，自相蹂践，死者不可胜计。布萨揆一路所向披靡，夺颍口、下安丰年（今安徽寿县）及霍江县（今安徽霍丘县），进围和州（今安徽和县），屯瓦梁河（今江苏六合西），控制了真（今江苏仪征）、扬诸州的要冲，江表大震。十二月，金将赫舍里子仁陷滁州（今安徽滁县），遂入真州，宋军被杀两万人，真州士民十余万渡江逃奔。淮西诸镇也落入金人之手。与此同时，富察贞破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犯西和州（今甘肃西和），四川宣抚副使叛宋降金，求金封他为“蜀王”，把大散关拱手相让，宣抚使程松逃之夭夭，四川几乎全部沦没。至此，除镇江副都统制毕再遇英勇抵抗，在楚州（今江苏淮安）打退了赫舍呼沙呼的进攻，接着又出兵六合，抵抗金兵，使淮东得以保全外，宋军各路纷纷失利，北伐彻底失败。

北伐失败，川陕、襄汉、两淮人民惨遭屠戮，怨声载道。韩侂胄虽屡次更换将领，试图挽回败局，最终无效，于是变计求和。金朝虽然也无力再战，仍然提出“称臣、割地、献首祸之臣”三个苛刻条件。韩侂胄断然拒绝，积极动员，准备再战。朝中主和派坚决反对，礼部侍郎史弥远和杨皇后勾结，发动政变，在十一月三日将韩侂胄杀死。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六月，宋朝将韩侂胄的首级送到金朝，按照金朝的要求，双方又重订和约。开禧北伐彻底失败。

襄樊之战

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忽必烈继承了蒙古汗位，改元中统。在地位巩固和经过长期备战之后，决定进行消灭南宋的战争。降将刘整指出，“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他认为，“如覆襄阳，浮汉入江，则宋可平也”。

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九月，忽必烈下令攻打襄阳，让刘整到襄阳协同蒙军主将阿术围攻襄樊。襄樊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开始了长达六年的关及南宋政局命运的襄樊保卫战。

襄樊军民，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誓与蒙古军队决一死战，以保家卫国。开始，蒙军对襄阳、樊城的进攻虽然猛烈不断，而且南宋陆上的援军也多次被蒙军打败，但是，南宋仍可从汉水运送粮食、军器、衣甲到襄樊，援助襄樊军民的抗蒙斗争，使蒙军不能得逞。

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蒙古军队认为要破襄阳必先围攻樊城。春天，打败宋将张世杰，七月，阿术打败樊城守将夏贵，秋天，南宋宰相贾似道命范文虎援樊城，又被蒙军打败。年底，襄阳守将吕文德死，其弟吕文焕继守襄阳。蒙军虽多次取胜，但久攻襄樊不下，便采取切断汉水通道的办法，准备困死襄樊。蒙古军在鹿门山、白河口修筑鹿门、新城等城堡，后又在汉水中流筑台，上设弩炮，同夹攻的城堡相应，来控制汉水通道。这样，南宋支援襄樊的衣甲粮食被切断，加之，南宋

水陆援军被蒙军打败，襄樊军民抗蒙斗争进入了困难时期。但是，由于襄樊军民同心协力，顽强抵御，所以，在战斗中的头几年，蒙古军队始终没有能够攻下襄阳和樊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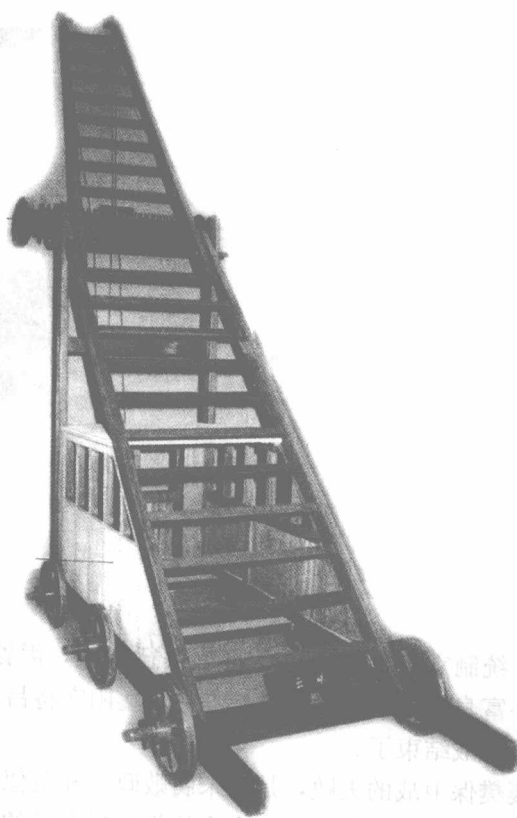
面对襄樊的危急局面，贾似道对宋度宗封锁消息，凡是说蒙军攻宋的，就被贬斥以至被杀。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南宋命李庭芝为荆湖置大使，督军进援襄樊，贾似道又答应宋将范文虎不受李庭芝节制，而直接听命于贾，从而牵制了李庭芝援救襄樊的战斗行动。李庭芝多次要进军，范文虎拒不出兵，却“日携美妾走马出球军中为乐。”南宋统治集团之腐败可见！

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五月，因受到襄樊军民坚决抵抗，蒙古军久攻两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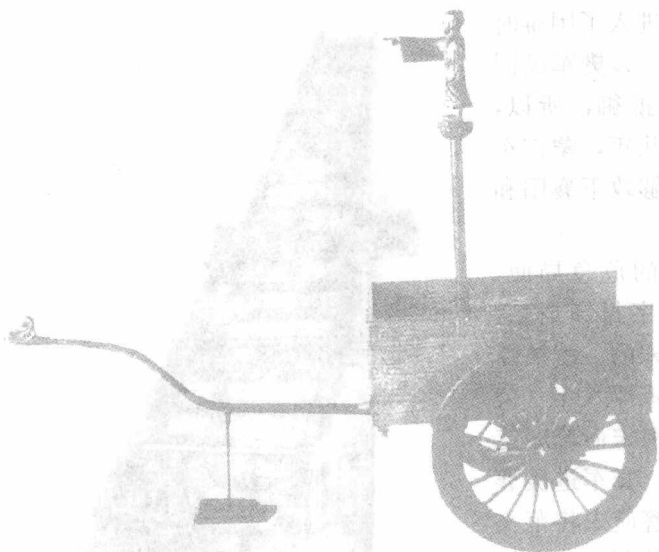
不下，于是忽必烈在命令蒙古军队继续围攻襄樊的同时，又派赛典赤、郑眠率蒙古军水陆并进，攻打嘉定，汪良臣、彭云祥率蒙古军出重庆，札刺不花率蒙古军出泸州，曲立告思率蒙古军出汝州，以此牵制宋军，进一步孤立襄樊。十一月，蒙古建国号为元，表示元王朝是封建正统，为灭宋统一作最后的舆论准备。此后，元军更加紧进攻襄樊。

公元1272年三月，樊城的外城被元军攻破，宋军退守内城。襄樊被围五年，外援断绝。李庭芝请义军首领张顺，张贵前去支援。兄弟两人在与元军战斗中，英勇作战。张贵被俘后拒不降元被害牺牲。而襄樊在张贵失败后，与外界隔绝，处境尤为艰苦。

由于襄阳、樊城隔汉水而立，宋军原在汉水中植木，以铁索相连，中造浮桥，作为襄、樊两城相互支援的交通要道。元军攻樊城不下，于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正月，采取了张弘范绝断襄、樊水上联系策略，派军攻断了浮桥，使襄、樊之间的交通隔断。元军便集中兵力连续猛攻樊城，在攻打樊城时，又使用了火力很强的西域“回回炮”，樊城终于被元军攻破。宋将都统范天顺力战不屈，城破自缢。



宋代攻城用的云梯（模型）



指南车

殉国。统制官牛富率领百余将士进行巷战，渴饮血水，继续战斗，杀死不少元军后，牛富身负重伤投火自尽。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向元军投降，可歌可泣的襄阳樊城保卫战结束了。

襄樊保卫战的失败，是南宋腐败政治和贾似道投降政策的必然结果。襄樊保卫战之所以能坚持六年之久，完全依靠襄樊军民的浴血奋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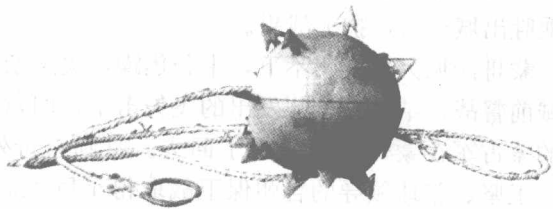
合州之战

宋淳祐十一年（公元 1251 年），蒙哥继任蒙古汗位，蒙古对南宋的进攻征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汗命其弟忽必烈镇守中原，并负责进攻南宋事宜。忽必烈在占领地区边耕边守、积粮备战，以便大举南征。忽必烈还向蒙哥汗提出先取云南大理，包抄南宋的策略。宝祐元年（公元 1253 年），蒙哥汗命忽必烈统率兀良合台等部蒙古军南征大理，完成对南宋的包围。忽必烈蒙古军巩固所占四川之地，为夺取全蜀作准备。

宝祐四年（公元 1256 年）。蒙古诸王和贵族出于掠夺的欲望，向蒙哥汗请求出兵攻打南宋。蒙哥汗为建立与父祖相称的功业，同时又想控制中原汉地，便决定亲征。次年，蒙哥汗以南宋抗蒙将领长期囚禁蒙古使臣月里麻思为借口，下诏出兵攻打南宋。蒙哥汗命诸王塔察儿统左翼军攻荆襄、两淮，由于塔察儿无功，宝祐六年（公元 1258 年）十月，改命忽必烈统左翼军。蒙哥汗亲统右翼军攻取四川。又命云南的兀良合台率蒙军从交广北上，与忽必烈会师鄂州（今湖北武汉），然后直奔临安，消灭南宋。

四川的蒙古军率先对宋军采取积极攻势，进逼南宋各城堡。蒙哥的先锋军由纽

璘率领，向成都进兵。连克彭州、成都，汉州（今四川广汉）、怀安（今四川全堂南）、绵州（今四川绵阳）、茂州（今四川茂汶）、威州（今四川理县北）相继为蒙古占领。



蔡藜火球（模型）

四月，蒙哥汗率四万蒙古军驻于六盘山，随后兵分三路入蜀。七月，至汉中。十月渡嘉陵江，进驻剑门。十一月攻破长宁山城（在剑门关西），进攻大获山（今四川阆中县东北），守将杨大渊投降。十二月又占领青居山（今四川南充南）、大良山（今四川仁寿境）。年底蒙哥汗与纽璘率军进到合州。

早在淳祐二年（公元1242年），余玠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时，便在合州修筑钓鱼山城，因山筑垒，屯兵聚粮，并移州治入钓鱼山城。合州知府王坚加以增修之后，合州更为坚固。在秦州（今甘肃天水）、利州（今四川广元）、巩州（今甘肃陇西）、阆州（今四川阆中）陷于蒙后，各地人民陆续到合州集结。合州成为十数万人聚居的重镇。

为攻下合州，蒙哥汗一面命纽璘在涪州（今四川涪陵）造浮桥，切断由荆湖西上的南宋援军。同时，又派使臣晋国宝到合州招降，被王坚严词拒绝。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初，王坚放晋国宝走后，又派人追他回到合州，在城内阅武场处死，激励将士坚守合州，明确表示了合州军民坚决抵抗的决心。随后，降将杨大渊率蒙军进攻，为合州宋军击败，揭开了合州保卫战的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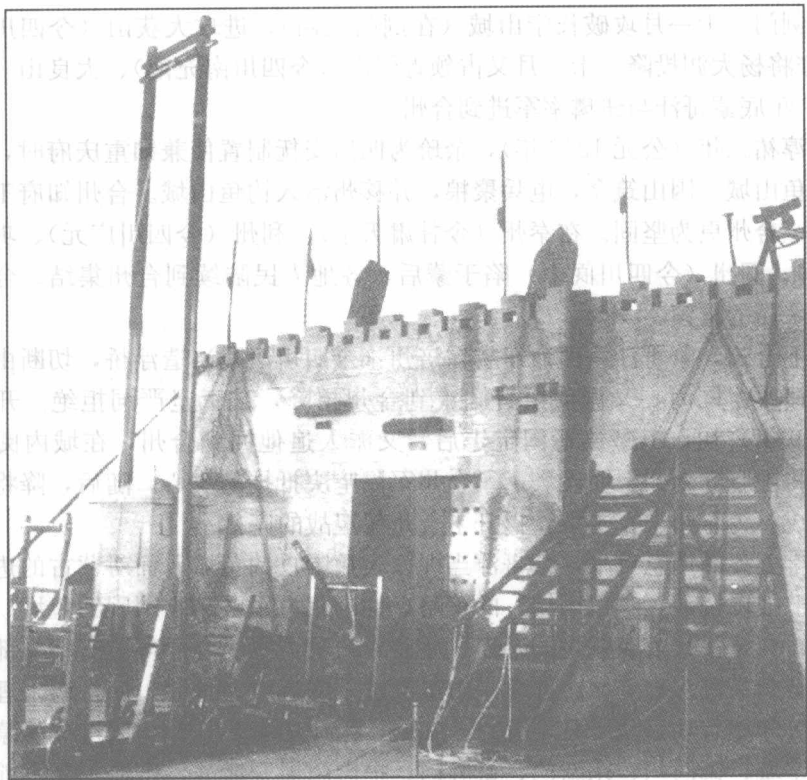
晋国宝处死的消息传来，蒙哥汗当即以大兵围攻钓鱼城。面对蒙古的进攻，王坚制定了“战以挠敌，守以固城”的策略。他趁蒙古军队刚刚围困钓鱼城，立足未稳的时机，亲自率兵夜袭蒙哥的营地，使骄横的蒙古军惊恐泄气。王坚与部将张珏照常领导合州军民协力守城，并多次击退蒙古军的进攻。为此，四月南宋理宗下诏嘉奖王坚等守城有功。从二月至五月，王坚、张珏亲率合州军民同进攻的蒙古军在合州的一字城、镇西门、东新门、奇胜门、护国门展开激战，击溃了蒙古前锋汪德臣的攻城部队，打败了蒙古增援部队董士元的精锐士卒。五月，蒙哥汗下令集合蒙古军队环攻合州，仍不见奏效。

当时四川大部分地区为蒙古军占领，重庆处于蒙古军进攻的矛头之下，川鄂交通又被蒙古军切断，合州形势危急。南宋命吕文德前往增援。六月，吕率水军向长江西上，乘顺风进攻涪州浮桥，冲过封锁线，进入重庆。随后率十余船，由嘉陵江北上，进援合州，为蒙古军史天泽部击败，而退回重庆。合州外援被断绝，但王坚、张珏依然率领合州军民坚守，抗击蒙古军。

一天，汪德臣选派蒙古骁卒夜登台州外城马军寨，杀死宋军寨主和守兵。王坚听说后，率兵来战，战斗一直进行到天明，宋军切断了蒙古军的云梯，使后继部队无法登城，终于打败了蒙古军，保卫了合州城。不甘失败的汪德臣又一次用云梯攻

城，并向城中喊话劝降，王坚部下士兵发炮击断云梯，汪德臣受伤，不久死去。王坚乘胜出城追击，扩大战果。

蒙哥汗见久攻合州不下，十分焦躁，决定亲自督战。七月，蒙哥汗又一次亲自到城前督战，结果被合州发出的飞矢击中，回营后不久便死在军中。围攻合州五个月的蒙古军在蒙哥死后便退了回去。听到蒙哥死讯，忽必烈亦率左翼军于九月北回。王坚、张珪领导的合州保卫战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合州之战扭转了整个战局。不仅攻蜀蒙军北撤，而且荆湖战场的忽必烈亦匆匆北返争夺汗位，解除了南宋长江中游的危机。南宋王朝灭亡的命运因而推迟。



宋代的攻城器械复原模型

扬州之战

襄樊战后，元军占领襄阳，打开了南宋的大门。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六月，元世祖忽必烈命伯颜率军伐宋。伯颜兵分二路，一路攻扬州，一路由他亲率主力沿汉水入长江，沿江东下，直趋临安。

公元1276年三月，伯颜率元军入南宋首都临安，俘宋度宗的全皇后、恭帝赵昀北去，南宋灭亡。但各地的抗元斗争仍继续不断，其中以李庭芝、姜才坚守扬州尤为壮烈。

阿术攻扬州数月不下，便派兵扼守高邮，断绝扬州粮道，使扬州断粮，死者充斥街道。饥饿使一些百姓无法忍受，宋亡而城围，他们不甘心降元，所以，几乎每天都有人投水自杀殉国，有的宁可割食饿死者充饥，继续战斗，也不向元低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李庭芝、姜才艰苦地坚守扬州。

已经降元的南宋谢太后和赵昀下诏书让李庭芝降元，李庭芝登上城墙，大声回答道：“只有奉皇帝的诏令守城，没有听说皇帝下诏投降的。”拒不接受降元命令。赵昀等南宋皇室被元军俘虏北上，途经瓜州，再次下诏降元，为李庭芝拒绝。为不让恭帝赵昀等南宋皇室被元军作为招降的幌子，姜才率兵数千出战，力图夺回皇室人员，继续号召抗元，但被元兵击败。阿术又使人招降姜才，姜才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宁可死，也不做降将军。”

在二月份夏贵以淮西全境降元后，李庭芝、姜才在扬州的处境更为困难。在李庭芝坚守扬州的时候，淮安、盱眙、泗州等地原也坚守拒元，后以粮尽降元，使扬州更为孤立。当时，城中没有粮食，李庭芝与扬州军民以牛皮、曲蘖为食物，拒战不屈。七月，阿术再次招降，李庭芝仍拒而不受。随后，李庭芝与姜才接到福州益王赵昀的征召，便准备渡海去福州继续抗元。李庭芝命朱焕守扬州，自己与姜才领兵七千先去泰州。朱焕在李庭芝走后，便开城降元，并把李庭芝部下将士的妻子押到泰州城下，以动摇军心。这时，元兵包围了泰州，裨将孙贵、胡惟孝等开城门接元兵入城。李庭芝听说城破便投水自杀，因水浅未死而被俘。姜才病发不能作战，也被元军所俘。阿术杀李庭芝，劝姜才降元，姜才愤恨不降，阿术刎姜才于扬州。

英勇抗元的扬州军民在李庭芝、姜才领导下坚守一年零三个月，在南宋的历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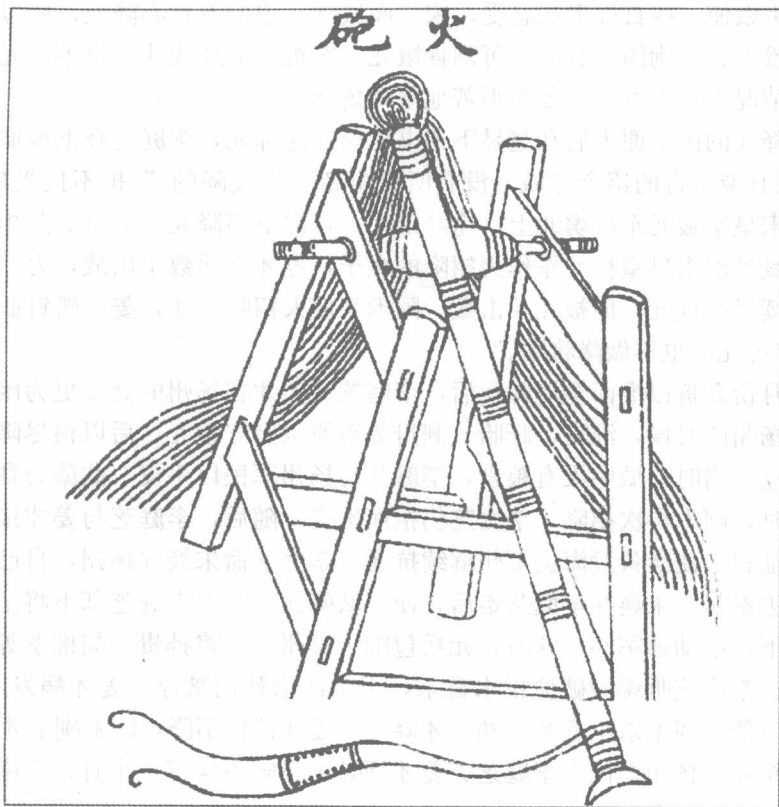
潭州保卫战

潭州保卫战是在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由李芾领导进行的一次悲壮的战斗。只有不足三千人的军队，抗御数万元军，竟坚持达三个月之久，它充分显示了潭州军民不畏强敌、敢于战斗的英勇气概，潭州城破之后，以李芾为首的潭州军民以身殉国，更反应了他们崇高的爱国精神和不屈的民族气节。这些都将永远记载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南宋贾似道兵败池州附近丁家州后，受到贾似道迫害的李芾被南宋朝廷委任为知潭州（今湖南长沙）兼湖南安抚使。这时，元兵南下，湖北州郡都已降附。他的朋友劝他不要去赴任，李芾不听，而决心以身许国；置个人的生死安危于不顾。

七月，李芾到达潭州就任。仓促之间，李芾召募士兵不足三千，他领导军民修器械、积粮草、筑工事。并与附近少数民族联结，互为声援。他推诚委任刘孝忠等将领统率军队，为保卫潭州作了多方面的准备。不久，元朝右丞阿里海牙占江陵，分兵守常德以遏制少数民族，大军趋攻潭州。

面对强大元军，李芾遣将率兵阻击，在湘阴战败。九月，李芾正准备再派军队



火炮 采自《武经总要》

出城抵御，不料元兵已经到了城下，很快便包围了潭州城。李芾登上城墙的女墙，慷慨陈词激励将士，并调遣将士分地段坚守。潭州百姓听到消息，不待号令便集合到城下，结成队伍来协助士兵守城。军民同心，坚守潭州城。

十月，元兵攻打潭州城西壁，将军刘孝忠率兵奋力抵御。李芾冒矢石、亲到城上督战。李芾亲自慰劳受伤将士，以保家卫国相勉励。在激烈的战斗中，潭州军民伤亡惨重，但是，许多受伤战士仍然坚守岗位，与元军作殊死的战斗。城中没有盐，李芾命令把库中积盐之席拿出焚烧，取盐供食用。元军攻城不下，便想招降李芾。李芾坚决抵制，他把招降使者处死示众，表明抵抗到底的坚强决心。

十二月，元军围潭州已经三个月了，仍攻不下，于是元军加强了攻势。将军刘孝忠被元军炮火击中，病伤无法继续战斗，这时，有的将领动摇了，他们打着为百姓着想的旗号来劝李芾：现在事情紧急了，我们当官的为国家而死，没有话说，这些潭州百姓就不必如此了。李芾生气地责骂说道：下令死守，敢有动摇者，立时处死。

除夕，元兵猛攻之后，终于登上了城墙，接着大兵进入潭州城。衡阳太守尹谷在城破后就全家自焚殉国，李芾在祭奠完尹谷后也全家自尽殉国。潭州百姓见城已

破，元兵到处烧杀，又听说李芾全家殉国，为免遭元兵的杀戮和凌辱，许多人都全家自尽。一时之间，潭州城内竟无虚井，全为自杀的潭州百姓所充斥。在树木自缢的也不在少数。潭州兵将，除吴继明等极少数将领投降外，绝大多数都已战死或自尽殉节了。

“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曾写过两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可作为至死不屈的爱国主义和高尚的民族气节的真实写照。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今江西吉安）人。年二十举进士，状元及第。任官后，为国事累忤宦官和权臣贾似道，被放外任。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为湖南提刑，次年知赣州（今江西赣州）。



文天祥

公元1259年，蒙古军南下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宦官董宋臣劝理宗赵昀迁都，文天祥上书坚决反对，并提出御敌之计，未被采纳。

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临安危急，南宋朝廷下诏“勤王”，只有文天祥组织了一支像样的勤王军。当时，朋友劝他不要去临安，说元兵猛而多，去亦无益。文天祥认为，国家一旦有急，召天下勤王，竟无一人一骑前往，自己深以为恨。现在不自量力，以身赴难。或许天下忠义之士能闻风而起，国家还可保全。他的妹夫彭震龙等也随从起兵。次年，出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出使元议和，痛斥伯颜，被拘至镇江。后脱逃，经真州、扬州、通州入海至温州，与陆秀夫等拥立益王赵昀于福州，复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公元1277年进兵江西，收复州县多处。终因寡不敌众，不久败退广东，坚持抵抗。公元1278年十二月，在五坡岭（进广东海丰北）被俘，坚拒元将张弘范诱降，书《过零丁洋》诗以明志。

赵昀小朝廷灭亡之后，被押到元大都。拘押三年，元世祖忽必烈屡劝其降，天祥宁死不屈，在狱中写下了名作《正气歌》，其中有：“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的凛然佳句。忽必烈劝降不成，遂于公元1283年一月，杀文天祥于柴市口。死时年仅四十七岁。

天祥到柴市临刑前问明方向后，面南再拜才受刑。其妻欧阳氏收尸，见其衣带

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作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欧阳氏说：“我夫不负国，我安能负夫！”遂自刭而死。

文天祥坚持抗元斗争，他至死不屈的爱国主义情操和高尚的民族气节，是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南宋灭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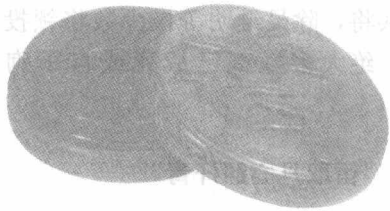
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建国号为元他在战胜了蒙古贵族中的反对派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以后，便把兵锋转向南宋王朝，准备最后消灭南宋、统一全国。在伐宋过程中，出现了抗元到底、坚贞不屈的将领，也出现了望风而逃、不战而降的懦夫。

战争好像一面镜子，每个人的人格与气节在它面前显露无遗。

公元1268年忽必烈便出兵进攻南宋，首先围攻襄阳、樊城，经六年的攻战，于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占襄阳、樊城，打开了南宋的大门。

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六月，忽必烈命左丞相伯颜率大军伐宋。伯颜分兵二道：一道攻淮西淮东，指向扬州；一道由伯颜亲率大军沿汉水入长江，沿江而下，直指临安。自襄阳失守后，南宋宰相贾似道继续推行民族投降政策，对准备灭宋的元军，却不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南宋军队遇到元军，不是一触即溃，便是叛变投降。七月，宋度宗死，贾似道立了四岁恭帝赵昀。九月，伯颜率元军主力从襄阳南下。首当其冲的是郢州（今湖北钟祥），郢州主将张世杰在汉水设防坚守、由于郢州军民的奋勇抗击，伯颜所统元军主力被阻郢州城下。伯颜决定不再攻打郢州，而率元军由旁边水道绕过郢州，再入汉水，进至沙洋。沙洋守将王虎臣、王大用顽强抵抗，元军用金汁炮焚毁民居，沙洋城破，元军屠城。接着进围新城，新城守将居谊拒不投降，并射伤前来劝降的吕文焕，终因寡不敌众，居谊同三千战士全部壮烈殉国。元军到达长江边的阳罗堡后，又遭到王达领导的军民奋勇抵抗，使元军进攻多日未能占领此城。于是伯颜分兵从上游四十里的青山矶强渡，攻占了阳罗堡，王达及刘成与八千将士英勇战死。元军渡江后，鄂州、汉阳相继降附。伯颜命阿里海牙守鄂州，并攻取湖南，自己亲率大军沿江而下。黄州（今湖北黄冈）奕喜、蕲州（今湖北蕲春东南）管景模、江州（今江西九江）吕师夔、安庆范文虎均不战而降。

鄂州等地失守后，迫于朝野舆论的压力，贾似道不得不在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二月率诸路精兵十三万，到芜湖抵御元军，并与夏贵合兵，即使大战在即，他还派宋京去与伯颜议和，许以输岁币称臣，被伯颜拒绝。贾似道不得不下令抗元，宋元大战开始，伯颜分步骑夹岸而进，又用战舰巨炮轰击孙虎臣军。宋军先锋姜子率军英勇战斗，主将孙虎臣却弃阵逃走，夏贵也不战而跑，贾似道惊慌失措，急命收军。元军乘胜追击，宋军大溃，军资器械尽为元军所得。贾似道与孙虎臣乘船逃



南宋·桂花纹剔红盒

到扬州。这次丁家洲之战，南宋水陆两军的主力几乎全部丧失。为南宋政权敲响了丧钟。

元军乘丁家洲大捷，沿江而下，南宋地方官相继逃遁和投降，沿江重镇，先后为元军占领，南宋朝中官员也纷纷出逃。抗元名将张世杰率军从荆湖入卫临安，收复了吉安、平江、广德、溧阳，刘师勇收复了常州。这样，浙江降元的一些地方官又反正归宋。在扬州，李庭芝、姜才打败了元军的多次进攻。七月，张世杰与刘师勇率万余战船主动进攻元军，进到镇江焦山，反为元军火攻所败。张世杰退往端山，刘师勇退回常州。

面对越来越险恶的形势，南宋朝廷下达了“勤王”诏书，但只有文天祥从赣州组织了一支勤王军于八月到达临安。随后，文天祥被委任为抗元前线的平江（今江苏苏州）知府。元军在推进过程中，遭到沿途人民的英勇抵抗。在无锡，军民顽强阻击元军。在金坛，人民组织义勇兵与元军奋战；在常州，姚嵩、陈炤、王安节、刘师勇等率军坚守达二个月，至十一月城破，姚、陈、王、刘仍率军民抗争，坚持巷战，最后仅刘师勇等八人逃出，全城惨遭屠杀。

从十月起，元军发起向临海的最后攻击，从镇江兵分三路：右军出广德攻独松关，左军入海奔澈浦，伯颜率中军攻常州，三路会师攻临安。

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底，临安军队有三四万人，文天祥与张世杰商议，要同元军决战，但宰相陈宜中正向元求和，不予同意。南宋统治集团不断派出乞和使者：先是求元军班师通好；后求称侄纳贡；再求称侄孙；最后求封小国、称臣。伯颜利用南宋投降求和，步步进迫。

理学开山祖——周敦颐

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世称濂溪先生，公认他为宋代理学的开山祖师。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太极图说》一卷，《通书》四十篇。其思想以《易传》和《中庸》为核心，又接受道教和佛教的影响而构成自己的体系。《太极图说》主要谈天道，《通书》主要谈人事。

《太极图说》里，他系统地论述了宇宙的本源、万物的演化以及人性善恶等问题。认为宇宙的本源是太极，太极的动和静产生出阴阳，阴阳二气交互作用生成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元素（即五行或五气）。他明确地指出：“自无极而为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成阴，静极复动”，产生出天地万物和人。阴阳五行是万物生成的必然环节，“无极之真，二五之精（二，阴阳；五，五行），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天地万物均可经由五行、阴阳的环节，归本于太极。“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周敦颐的“太极——无极”说规划出一个先于天地万物的宇宙本原，在认识上冲破了传统的“天地父子生成图式”，为后学者开辟了一个新型的思维天地。

周敦颐在《通书》中对《中庸》的“诚”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把“诚”解释为



周敦颐

人的至善的本性，是仁、义、礼、智、信这些所谓“五常”的根本。为了达到“诚”的最高境界，他提出了“主静”的修养方法。“主静”就是“无欲”。

张载的完整宇宙论

张载（公元1020年～1077年）是宋代又一理学家，他从另一角度探求世界本原，提出“太虚”本原说，建立了以气为本体的宇宙论，奠定了宋时理学的基础。

他认为“太虚者，气之体也。”气是太虚的具体形态，太虚是气的原初形式，所以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世间万物都是某种存在，既是存在，就有具体形态或形状，而具体的形态（状）都是由气凝聚而成，这就叫“凡可状者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气”与“太虚”的关系有如水之与冰，“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太虚即气”遂成为天地万物的本原。

张载指出：“盈天地之间者，皆物也”“理不在人皆在物。”这是说，世界是物质的，“理”——规律是存在于“物”，而不取决于人的。张载根据“太虚即气”的

唯物主义，对“一切唯心”和“有生于无”等佛老唯心主义哲学，给以深刻批判，发展了朴素的唯物主义。

张载的辩证法思想，是建立在“太虚即气”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之上的。他的“一物两体”的矛盾学说和“动必有机”的内因发展观，丰富和发展了古代辩证法。

张载是有宋以来第一个从理论高度全面辟佛、道的儒家学者，他的思想体系是宋明理学发展的雏形，对程朱理学的建立有很大影响。

理学的奠基者——二程

程颢（公元1032年～1085年）字伯淳，程颐，字正叔，他们两人是亲兄弟，都是周敦颐的学生。由于哲学思想的一致，人们称他们为“二程”。周敦颐兴理学之始，但程颢、程颐对理学发展却起了突出作用，是理学的奠基人。二程哲学体系的核心是“理”或“天理”。他们的“理”或“天理”是对周敦颐“太极”说的继承和发展。这个“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是天下万物都要遵循的普遍原则，是永恒存在的。理不仅是自然界的，也是社会的最高原则。理是先于气（事物）而存在的，人和物“都自这里出”，理是第一性的，气是从属于理的。每一物都由理产生，每一物也就体现了完全的理，理能产生万物，又能统辖万物。程颢说：“天者理也”，认为天就是最高的实体。这个“理”凌驾于万物之上，先于万物而存在，永远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他又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他所讲的永恒的理，就是君臣、父子的封建等级关系，封建伦理道德，这是唯一的理。所以程颐就说：“天下只有一个理”。二程主张“明天理”，对劳动人民来说，就是不能违反封建伦理道德。



《二程先生全书》书影

在天人关系上，二程坚持“天人相与”的观点，建立了一种更为精致的“天人合一”说。在认识论方面，二程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他们认为，一切知识“皆出于天”，真正的知识、才能并不是在实践中获得的，而是人头脑里固有的。人们只要修身养性，求之于内心，就可以悟出“天理”，认识一切。

二程的学说中，也承认万物变化无穷。程颐说过，“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终”。但是他们特别强调变中有不变的东西，认为不变才是根本的。这个不变的东西就是道，也就是理。万物的变化，都要受道或理的支配。

二程兄弟的思想虽基本一致，但仍表现出不同倾向。程颢重视人的主观精神的作用，提出“心即理”，表现出心学的思想倾向，启发了陆王心学；程颐则表现出



程颐像

理学的思想倾向，他提出“理一分殊”说，这些思想都被朱熹继承和发展，成为朱子学的思想材料。二程思想的不同倾向，导致了后来“洛学”的分化，也为南宋“理学”和“心学”两个独立学派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因素。

二程所宣扬的理学思想，是同他们的政治保守态度和复古的历史观相联系的。他们都反对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提出“新学”，作为实行变法的理论根据。二程对王安石的新学全盘否定。理学家们根据封建的等级制度、法律、伦理道德等，指责王安石变法是“用贱凌贵，以邪妨正”，完全颠倒是非。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政，不得不摆脱保守势力，起用一批新人。二程等一班理学家就退居洛阳，洛阳成为理学的根据地，二程的理学被称为“洛学学派”。

理学集大成者——朱熹

到了南宋时期，封建小朝廷偏安于江南，民族矛盾和农民起义更趋激烈。理学思想在二程学说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代表人物就是朱熹。

朱熹（公元1130年～1200年）早年主张抗金，中年以后转持消极防守。早年

除研习儒家经典外，于佛教、禅学、道经、文学、兵法等无所不学。曾受业于胡宪、刘子翠、李侗，得程颢、程颐之传，兼采周敦颐、张载等人学说，集北宋以来各派理学之大成，逐步建立起完整而系统的理学体系。其学派被称为“闽学”或考亭学派、程朱学派。他的著作很多，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太极图说解》等。他的弟子还把他在讲学时发表的言论，编成《朱子语类》。

朱熹哲学体系中的基本范畴是“理”。在宇宙观上，他认为“理”是万物生成的本源，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理一分殊”；万物有万理，万物均源于天理。一理摄万理，万理归为一理。有“理”而后有“气”，“理”“气”不可分，但“理”为本而“气”为末，理为先而气为后。

在认识论上，他主张“格物致知”，认为知识是先天固有的。但由于“利欲所昏”，使“知”有不至。应该用吾心的天理与外物的天理相印证，以推致我先天所固有的知识。

在人性论上他认为“性”是一切生物所据有的天理。他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命之性是“专指理言”，是至善至美的，“理”“气”相杂的“气质之性”则有善有恶。他把传统的纲常学说加以理论化、通俗化，把“三纲五常”当作社会的最高道德标准，人们须“去人欲，存天理”、“正心诚意”、“居敬”“穷理”以“求仁”。

朱熹是有神论者。他说：“帝是理是主”。上帝就是理，就是万物的主宰者。理是统治一切的。他又说：“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有父子之理。”不论谁是君，谁是臣；谁是父，谁是子，君臣父子虽然有生有死，但君臣父子的理，也就是忠君孝父的伦理道德是永恒不变的。

朱熹还提出复古的历史观点。他同永康学派陈亮从通信中开展了辩论。朱熹认为夏、商、周三代的帝王是按“天理”行事的，因此出现盛世；汉朝和唐朝的皇帝是照“人欲”行事的，因此出现乱世。他主张要恢复三代之治，走历史的回头路。这就暴露出朱熹在政治上倾向保守的一面。

从南宋后期起，朱熹所提出的程朱理学被统治者尊为正统，长期居于统治地位。

除了建立一套哲学理论外，朱熹和他的弟子们，在学术文化上做了大量工作，涉及政治、宗教、教育、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朱熹为了“致知”，他博览各种图书，接触到许多知识部门，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他说地球是由物质的气凝聚而成的。地球是圆形体的。月亮本身没有光，月光是日光的反射。朱熹一生创办书院，收罗门徒，从事教育工作。他的博览精神、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对当时和后世学者，产生较深的影响。

朱熹亲手制订了《白鹿洞书院学规》，规定学习的程序和方法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提出了：学、问、思、辨、行这五个字，是他办学的一套比较完整的经验。他是提倡“循序渐进”的学习原则的。这是符合认识发展规律的。他还提倡“熟读精思”的学习方法，认为“大抵读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之于我之口；继之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之于我之心，然后可以有得